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张海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130295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K250.7-53  
17

#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张海鹏◎著



北航 C163840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250.7-53  
1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 张海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2078 - 1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5488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出版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刘俊  
责任印制 戴宽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25  
插 页 2  
字 数 416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130295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 目 录

关于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热点问题的讨论 .....	(1)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转折 .....	(27)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现代意义 .....	(60)
当代中国历史科学鸟瞰 .....	(66)
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	(80)
论牟安世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	(126)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理性提升的历程 .....	(1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	(148)
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 .....	(160)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	(169)
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 .....	(186)
中日关系的现实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	(205)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反侵略问题	
——与一些流行的观点商榷 .....	(227)
试论罗尔纲史学研究的新生命	
——《罗尔纲全集》出版前言 .....	(251)
认识台湾历史的特点与对台工作的复杂性 .....	(265)
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趋势蠡测 .....	(284)
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	(295)
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	(303)
19世纪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 .....	(342)

大国兴衰给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	(356)
深入钻研马列主义，提高宏观史学研究水平	
——张海鹏研究员访谈录 .....	(381)
后记 .....	(409)



## 关于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热点问题的讨论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正在学术界广泛、深入地进行。近代中国的历史又是社会各方面所关注的对象。对中国近代史发表见解的人，许多并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他们的意见通过报纸书刊、电视剧在各种媒体上传播，其影响往往比专业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要大得多。本文不是专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综述和评论，而是对若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观点（包括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所发表的），加以介绍和评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思想活跃，异彩纷呈，这当然是好现象。但是有一些人士由于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不正确的理解，也产生了一些对中国近代历史现象的不大正确的看法，引起了讨论。也有一些是学术界的正常讨论，其讨论情况对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是有意义的。

### 关于近代中国“开关”的讨论

20年前，有文章讨论所谓“开关”问题，认为英国以资本主义文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如果中国不抵抗，中国早已现代化了。这篇文章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王国”，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如果来得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这种观点还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文明是无国籍的。难道为了‘抗拒’外国，宁肯让我们中华民族退到刀耕火种不成？”它似乎要告诉人们：由于资本主义文明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落后的封建中国时，中国只能敞开大门让其侵略，绝不能反抗，多出几个林则徐似

的民族英雄也无济于事，不过延缓接受资本主义文明的时间罢了。<sup>①</sup> 这样提出问题，不仅涉及怎样看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而且涉及中国人民要不要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这是我所见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提出的近代中国不要抵抗侵略的见解。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的注意。近代史研究所曾为此文召开过一次座谈会，当时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刊载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sup>②</sup> 座谈会后，我本人曾撰写一篇商讨文章，题为《也谈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开关”》，发表于1987年《红旗》杂志第6期。<sup>③</sup>

这篇鼓吹对外国侵略不要抵抗的文章，显然是把资本主义文明的传播与侵略混为一谈了，是把改革开放以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与一百多年前清政府被迫引进资本主义文明混为一谈了。今天的开放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采取的主动行动，它同清末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下，腐败的清政府被迫实行开关不能同日而语。因而在探讨近代史上的“开关”问题时，必须注意区分不同历史时期两种“开关”的不同出发点（或历史前提）和后果，不能有意无意地把它们混淆起来。

早在1847年，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期，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指出了资本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推广它的制度。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批评或者剥夺落后国家抵抗资本主义文明侵略的任何

① 吕兴光：《应当如何认识近代史上的“开关”》，《北方论丛》1986年第3期。

② 《怎样看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学术座谈会纪要》，《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1986年第2期。

③ 该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在理论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又收入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又见中国海关史学会编《中国海关史论文集》，1997年10月。

手段，而是高度称赞这种抵抗侵略的正义性。他们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和殖民主义侵略的野蛮性区分开来看待的。

资本主义生产力创造的物质财富比封建主义社会长期积累的财富还要多，这是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步。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虽然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逐步认清这一点后，努力学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学说，但是，用大炮和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能看作是一种文明的行为。即使是一种最好的制度也不能用武力形式强迫别人接受，就好像今天美国用最先进的武器在中东推行美国式民主，受到世界广泛质疑和反对一样。况且，美国式民主是不是具有普世价值，也是遭到广泛质疑的。英国用非法的鸦片走私和军舰、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便进行野蛮的掠夺。这是中国被迫开关的直接原因。鸦片贸易是赤裸裸的掠夺，不带有任何传播资本主义文明的性质。西方有些学者把鸦片战争称之为“争取平等通商权利的战争”，而讳言鸦片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毒害，是出于对殖民主义侵略的辩护，是对可耻的鸦片贸易的美化。在这里，武力打关、鸦片走私和侵略几乎是同一含义。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后果呢？除了《南京条约》成为此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与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范本，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因而从一个重要方面规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外，并没有立即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英国那时开始工业革命还不到一个世纪，它的经济实力还不允许它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它所关心的主要是通过超经济的办法实现其对华掠夺。就贸易关系而言，这期间进口的棉布和棉纱较之鸦片战争前，有的只略有上升，有的甚至减少了。列强对华进行经济掠夺最得心应手的手段仍然是鸦片贸易。鸦片在中国的进口贸易中仍占第一位，由于从非法转到公开，进口数量成倍增长。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绝不是要把落后的中国变成先进的中国，而是要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中国资本主义之不能迅速发展和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不能迅速解体，是与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合拍的。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前景。

所谓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清政府反击英国的侵略是正义的，虽然这种反击失败了。广东等各地人民在得不到政府支持下

主动起来抵抗英国军队的进攻，无疑是正义的。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发动广东民众抵抗侵略，无疑是爱国主义的行为，应该得到后人的尊敬，轻蔑地耻笑林则徐的行为，是无知的，也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

说中国早点“开关”，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就早已现代化了，也是一种无知的妄想。资本帝国主义强行进入中国那种“开关”，无论早晚，情形都差不多，早的话情况甚至可能更坏一些。印度是最有力的例证。早在16、17世纪期间，印度的门户就被打开，在18世纪中叶，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其开关可谓早矣。印度的面貌如何呢？是不是比中国的情形更好些，比中国少受一些屈辱？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印度的情形显然不是那样。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以及变印度为殖民地的整个18世纪内，英国在印度进行了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其攫夺所得，大大超过了贸易所得。印度殖民地的存在，构成了18世纪英国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在把印度变成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过程中，英国还有意保存和利用了当地的封建土地关系，野蛮地剥削和掠夺印度农民，使那里土地荒芜，农业衰落，饥荒频仍，尸骨枕藉。印度人民不仅没有享受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幸福，反而比以往受封建统治更痛苦，陷入更赤贫的境地。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在西欧与封建主义做过殊死搏斗的资本主义文明，到了亚洲又同落后的封建主义携起手来；欧洲文明的资产阶级在亚洲干出了很不文明的事情。英国侵略印度的结果，何曾给印度人民带来什么好处？！还有，数百万印第安人被屠杀，成千万黑人奴隶被贩卖，成百万华人“猪仔”运往世界各地，这不都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时期创造的“奇迹”吗？可见，主动开关与被动开关，情况是绝不相同的。主动开关，主权在我；被动开关，主权为人所制。事实上，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各国包括那些口称自由贸易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即时而开关，时而闭关，在一些贸易上开关，在另一些贸易上闭关的政策。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动开关，被迫协定关税，一个主权国家的起码的权利为列强所夺，中国人甚至不能主持本国管理海关的行政机关。中国的“关”是开了，可是这个“关”丝毫不能起到保护中国工、农、商业的利益，中国能从这个开关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还不说从《南京条约》开始，中国几乎被迫同当时所有

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单是赔款一项，仅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辽南条约》、《辛丑条约》的字面规定上略加统计，就达7亿1千多万两白银；至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所谓条约权利和领土的损失，就不是这里所能道其万一的了。我们评价中国近代开关的好与坏，绝不能撇开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凭着主观设想来发议论。

## 关于太平天国性质的讨论

太平天国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爆发的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巨大的农民战争之一，又是一次带有新的时代特点，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区别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是明显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不断掀起高潮，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也有拔高的现象，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拔高现象更为明显，这样在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中就出现了违背历史事实的现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逐渐纠正了太平天国研究中不正确地拔高太平天国的不良学风。同时，太平天国的研究，也逐渐走向退潮。这本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

20世纪80年代末，又出现了极力贬低太平天国的情况。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卷，把太平天国贬为“神权政治”，认为这种“神权政治”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认为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中国将会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曾国藩率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代，是挽救了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东安研究员曾著文反驳。<sup>①</sup>近年来，否定太平天国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声音又有升高。200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潘旭澜著《太平杂说》，2001年史式发表的《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这一书一文是一个标志。《太平杂说》指斥洪秀全是“暴君”、“邪教主”，认为洪秀全“披着基督教外衣，打着天父上

<sup>①</sup> 朱东安：《“神权政治说”质疑》，《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sup>①</sup>。还说洪秀全“为了当天王而造反，他的邪说和暴政，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劫难，就应当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邪教主和暴君”<sup>②</sup>。史式则拿当今评价“邪教”的标准与太平天国相比附，认为“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sup>③</sup>。这是拿现实政治中某些现象与历史上类似的现象相比附的结果，而这种比附是不恰当的。把太平天国看作邪教，正是太平天国的敌手当时的看法。奉曾国藩之命编纂的《贼情汇纂》就说：“从来叛逆多借邪教倡乱，而粤匪为尤甚也。”<sup>④</sup>

对于这种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见解，学术界许多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太平天国历史学会会长方之光提出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方之光认为，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史实与史观结合的大历史范畴，实事求是地评价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宗教观，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还指出：对造成“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大灾难”的，究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是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起义和革命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批判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作者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所奉行的天道观与封建皇帝的天道观是对立的。清王朝和曾国藩等的天道观，是要保卫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天道观是要打破维护帝制的纲常名教，实行“天下为公”的“公平正直之世”。作者认为，否定太平天国，为曾国藩翻案，实质上就是为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清朝统治者翻案。<sup>⑤</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春涛在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以八章篇幅研究了太平天国上帝教的兴起、传播及其陨落

① 转引自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6页。又见潘旭澜《洪秀全的政治性邪教》，《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

② 潘旭澜：《关于洪秀全答“商榷者”》，《学术争鸣》2005年第9期。

③ 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开放时代》2001年1月号。

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第9卷，载《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251页。

⑤ 方之光、毛晓玲：《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吗？——与潘旭澜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9期。

后，又以一章（最后一章结束语）篇幅回应了有关太平天国“邪教”的见解，他的结束语题名为《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正》。作者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有关“邪教”定义的渊源，认为宗教上的正邪之争自古有之，大约在唐宋时期便形成“邪教”概念，“邪教”成为官方贬斥民间宗教的代名词。民间宗教所以被指斥为“邪教”，主要有宗教与政治两方面的因素，而以政治因素为主。历代封建王朝将民间宗教视为“邪教”，纯粹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政治需要。民间宗教是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本质上反映了封建时代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封建暴政是酝酿民间宗教的温床，民间宗教的兴起又是对封建暴政的无声的抗议和挑战。夏春涛认为，尽管民间宗教是一种落后的斗争武器，带有与生俱来的封建色彩，无力或无法最终超越封建统治秩序，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社会，但它反抗封建暴政斗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是不容否认的。因此对于历史上民间教门反社会、反政府的行为，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必须做出具体分析。民间宗教也是一种宗教，它与传统宗教并无所谓正与邪之分。这与当今冒着宗教名义建立的祸国殃民的非法组织是不同的。<sup>①</sup>至于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夏春涛认为，它是一种典型的民间宗教组织，这种组织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特点。与基督教相比，上帝教具有鲜明的形而下色彩，它从属于世俗的政治斗争，是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主旨并不是追求个人的精神超脱、灵魂不朽，或实现无区分的人类博爱，而是以斩邪留正、营建人间天堂为己任。太平天国政权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也不可相提并论。洪秀全所代表的太平天国与曾国藩所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绝不是什么神权与人权之争，而是两个对立的政权、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殊死决战。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描绘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前景，无疑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所能萌发的最为美好的公平社会。<sup>②</sup>实际上，太平天国

<sup>①</sup> 参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9—44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46—448页。

所要破坏的是一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公平正直的新社会。这与所谓反社会、反人类是根本不同的。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忽略了肯定太平天国的历史前提。

##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反侵略问题的讨论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存在一个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反侵略的事实。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近代史学界，也在努力通过学术的研究，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从史学的规范上论证这一事实，恢复这一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实，不仅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书是这样写的，1949年以前很长时间里，许多历史著作也都是这样写的。就是今天西方国家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的近代历史的时候，也都承认近代中国的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已故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晚清中国史》，也大体上如实记载了这个历史事实。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的反侵略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并无根本分歧。2006年1月，有一位客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集中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反侵略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这篇文章不仅对义和团反帝斗争大张挞伐，而且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反侵略问题也发出了质疑，问题提得似乎振振有词，对一些缺乏近代史知识的青年读者产生误导。

这篇文章名义上针对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是针对我国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我尊重作者发表见解的权利，但我不能赞同作者的见解。为此，我曾在2006年3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发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一文，对上述文章加以评论。按照《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的说法，如果清政府好好与英法等有关国家谈判，遵守条约规定好好与外国谈判修约，不要在广州搞什么反入城斗争，不要在大沽口反抗英法军舰的侵略，不要指定英法代表进京换约的路线，火烧圆明园的事就不会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打不起来了。作者说：“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



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sup>①</sup> 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主要不是修约和广州入城问题，而是侵略和反侵略问题。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只是两条表面原因，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它们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所谓“马神甫事件”、“亚罗号事件”就是这样的借口。

要求修约，是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国拿到更多权益的策略手段，换句话说，是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成果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国就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向中方提出修约要求。这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文翰提出修订《南京条约》问题，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国应毫无保留地给英国人开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国人走遍全中国不受任何限制。其实，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学者早已指出，英国要求修订《南京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南京条约》是一项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没有修订的规定；而修约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英国利用中国当局不了解欧洲的国际关系知识，加以蒙哄和欺诈，清政府只有被牵着鼻子走了。1855年，美国任命传教士伯驾为驻华公使，给伯驾的任务，是要他从清政府取得公使驻京、无限制扩大贸易以及取消对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项主要权利。伯驾在来华前，遍访了伦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

<sup>①</sup> 参见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冰点》2006年1月11日。